

CONFIDITE EGO VICI MYNDVM

IOHANNES MATTHEVS

LYCAS MARCVS

南怀仁 《教要序论》 训诂学研究



张玉梅 著

ECCLESIA CHRISTIANA ECCLESIA ANTICHRISTICA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南怀仁
《教要序论》
训诂学研究



张玉梅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 / 张玉梅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325-8209-9

I. ①南… II. ①张… III. ①罗马公教—教义—概论
②《教要序论》—训诂 IV. ①B976.1②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1002 号

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

张玉梅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惠敦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8.125 插页 2 字数 407,000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209-9

H · 155 定价: 7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带一路”智库理事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阶段性成果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重点项目“汉字取象研究”
(项目批准号: 13ZS015)阶段性成果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术领域文化专项项目“域外汉籍研究
(《世说笺本》等)”(项目批准号: 16JCWH16)阶段性成果

序一 训诂与诠释的新境域

李建国

玉梅的大作《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即将付梓，应出版社之请，索序于我。只是自觉惭愧，三十余年来，奔走于出版、市场之间，出入于编辑、教学之列，徒有学者之名，而不敢以陆宗达师弟子招摇。今于玉梅的大作，亦仅依第一读者的本分，拜读之余，略抒心得而已。

《教要序论》是比利时教士南怀仁对明朝来华传教的利玛窦等人所著《天主教要》（约 1605 年）一书的再诠释。意大利人利玛窦是西方教士来华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最早阅读并钻研中国典籍的西方学者。他除了以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通过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输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后万历四十三年（1615）就有传教士王丰肃的《天主教要解略》，对《天主教要》经文作注解。南怀仁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来华传教，后于利玛窦半个多世纪，是时明亡清兴，江山易手，中土已是大清帝国的天下。从明初西人来华传教至康熙九年（1670）南怀仁《教要序论》出版，时历百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时

段。这一时段西方传教士著述颇多,而南怀仁《教要序论》尤为著名。其因有二:一是南怀仁来华十余年间,就已娴熟地掌握了清代官话,精通汉语经典文献,具备了通古今、兼中西的独特学养。于是他在借鉴《天主教要解略》等前人著作的基础上,用传统汉语训诂的方式系统诠释《天主教要》的教理,著成集大成式的《教要序论》。二是他精通天文历法,擅长交关贵游,曾为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任职钦天监副监,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当是来华教士中官职最高者。中国向来是官高而言自威,位重而书即贵,所以《教要序论》便成为西方传教士诠释《圣经》中的扛鼎之作。

玉梅《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选择《教要序论》为核心文献,上联下系,考镜源流,对 16 世纪初至 17 世纪末叶一批相关的基督教汉语典籍进行训诂学的专门研究。它以明清之际中西语言文化交融的大视野,观照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等用汉语训诂学的体式方法诠释《圣经》,比较汉语训诂学与西方诠释学的同异,属于跨文化的学术研究之畴。诚如作者所说:“本书着眼的是西来传教士群体所代表的圣经诠释学与中国本土训诂学的对比与研究,及由此所呈现的中西方文化交融。”无论是选题的角度和思路,还是研究的方式方法,都显示了 21 世纪以来新一代学人的治学理念、学术风格和科研特点。毋庸讳言,新一代学人所接受的系统性教育,所具备的外语造诣,所秉持的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所拥有的视野、识断、理念和方法,所习得的公关能力等等,都是吾侪不能比肩的。因此,他们的学术成就超越前辈自是不言而喻的。

汉语训诂学是中华本土发端最早的语言学科,从先秦至今,已历二千余年。在其漫长的发展史上,先后有两次重大的中外语言文化的对撞、交汇和融合,程度不同地为汉语文化注入新机,为传统语言学,特别是训诂学,提供了新的理念、方法,乃至著述体式上的借鉴。

第一次中外文化的交融,发生在两汉之际,至唐代而大盛。汉武帝内倡文教,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外施武功,穷兵黩武以扩充疆域。期间,张骞先后两次通西域,开辟了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从此中亚各国使者、商人、传教士等源源而来,络绎不绝,促动中华文化的发展。其中以佛教东来给予汉语文化的影响最为巨大而深远。佛教僧侣为传教翻译佛经,输入印度声明学,发明反切注音法,汉语声、韵、调研究趋于科学,从而催生了汉语音韵学。因佛经翻译之需,大量双音节和多音节词语产生,推动汉语词汇由单音词向复音词的迅速转化。复音化引发了构词方式的变革,促成了训诂音义之学的成立。佛教徒讲经布道、阐述教义的法式,启发了经学训诂义疏体式的诞生。此外,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中国文化的渗透更大,以致中国化的佛教一经形成,即与本土儒教、道教鼎足而立,汗牛充栋般的佛藏经典亦与儒藏、道藏经典一起,成为传统文化的历史遗存,影响至于今日。毫无疑义,除了政治、经济等因素外,三教文化的融合会通、并行不悖,是促使中国社会进入鼎盛期的李唐王朝的重要基因。过往论述训诂学发展,往往以汉代为参照系,概谓唐代训诂为“保守期”,未必尽然。事实上,在中外文化沾溉下的隋唐训诂学,乃是与时俱进,创新良多。

第二次中外文化的交融,则在明末清初之际。与第一次佛教东来后的中外文化交融不同,此时的中国社会已由昔日上升期的辉煌转入季世的衰微。虽然有唐宋以来新兴海上丝绸之路不绝如缕的传输,中外文化交流的规模已非汉唐旧观。尽管其时西方教士来华传教布道,部分先觉的中国知识精英也接受了西方科学,但因传教士人数偏少,时空跨度不大,天主教经典相对单一,中土信众分布不广,尤为重要是未获中国官方认同,最终未能像佛教一样植根中国、成为本土化的宗教文化。随着清政府海禁日烈、排外趋紧,中西文化交流陷于停滞,西方教士的汉语《圣经》译著虽有千部之数,既被封禁,复多尘封于欧洲诸国,遂为国人所不知,自然难入学术研究之林。近四十年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门洞开,西学汹涌而至,宗教自由,天主教、基督教信众日夥,发展迅猛,有关明清之际西方学者的汉译著作渐为学界所关注。汉语训诂学作为中国古代经典解释学,既然坦承佛经语言研究可入训诂学史之畴,明清之际西人以汉语诠释《圣经》的著作也就没理由不在汉语训诂学的观照之中。无论是从尊重既有的历史事实出发,还是从当今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实际需求计,都不能无视这一客观存在。所以我是赞成本书作者的基本观点的。

本书是基于训诂学的天主教核心文献研究,通过诸如内容、术语、方法、价值等方面的穷尽式的考证和比较,揭示了古代汉语训诂学与古代西方诠释学的相类、相异及其原因。在传统汉语训诂学以今释古、以易释难之外,注入了“以中释西”的异文化比对,别开了训诂与诠释相因相成的新境域。同时,借鉴西方诠

释学的经验,在夯实训诂学自身建设的同时,为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全民信仰的修复探索新的路径。因此,本书的写作,不唯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且具有观照现实、服务当下的经世致用的意义。

玉梅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是许嘉璐先生兼职教授时的训诂专业博士生。许先生以汉语训诂学名家,近三十年来,在从政、教学之余,以极大的热忱,锐意思考、深入研究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问题。他站在时代前沿,高瞻远瞩,以世界性的学术眼光,大力倡导沟通古今、融汇中西,身体力行地积极从事复兴中华文化的伟大事业,不懈地寻求世界宗教文化求同化异、和谐发展之道。大约在2008年的夏秋之交,玉梅获知业师在北师大讲座的信息,便专程由沪赴京听课。她是治学的有心人,具有敏锐的感应力,善于发现并捕获最新学术信息。课后她来寒舍看我,兴奋地谈起所受业师的启发,当时便萌生了将汉语训诂学与西方诠释学作比较研究的念想。她更是尚志问道的恒心人,身处繁华世界,毅然“求其放心”,沉稳执着于学问。返沪后,她便开始关注中西文化交流领域的资讯,着手收集材料,从宏观上进行比对分析。2012年秋冬之际,她借承办“中西知识论与诠释学: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机,提交并宣读了《中西会通:传统训诂学与古典诠释学之比较研究》的论文,并征询与会中外学者的意见,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和广泛的认同。翌年9月,她赴比利时鲁汶大学访学。一年之中,伴随着鲁汶的钟声,从城南的住所走到市中心的图书馆,晚上复返回住所,无非是读书、打字、查找并复印资料,此外就是有主题地约

访欧洲汉学家。在此期间,她发现了尘封已久的线装本馆藏中国明清基督教典籍,出于好奇与敬畏,开始阅读和思考。于是,南怀仁《教要序论》进入视野,她迅即意识到:它是训诂学的,也是诠释学的;就像它的作者南怀仁一样,原本是外国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最终他/它是融合了中西方两种语言文化的上帝的子民。是的,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宗教、文化呈多元形态,但终究会“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只要不抱偏见,就应承认诸如《教要序论》之类的著作,它们是中西语言文化合璧的瑰宝,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文化遗存,因此是值得探究的新课题和新领域。于是,玉梅的宏观研究找到了具体而实在的切入点,她也就此开始了本书的写作。

玉梅在鲁汶往返于两点一线式的访学生活,紧张、忙碌、辛苦而又充实。“充实之谓美”。她不时应约专访欧洲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贝罗贝(Alain Peyraube)、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等,陆续有学术专访文章在国内发表;不时地将已成文稿传我征询意见,终于在回国前夕完成了本书的初稿。又越一年,广求高明,数易其稿,方得完璧。屈指算来,从萌思、准备到成书,忽忽已历七载了!玉梅不受时下急功近利的诱惑,专心治学,在尚无前人涉足之域辛勤耕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收获了第一部研究成果,可喜可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玉梅出自名师,学有本源,“深造之以道”,复有自得之果,心中蕴积既多,必也左右逢源,则其将来,可期而待也。北宋理学家陆九渊

说过：“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知本”是治学的入门功夫，即由文字训诂而熟知经籍原旨，在此基础上，纵横旁达，左右采获，方能做到“六经皆我注脚”：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得圣贤义理。若学不知本，难免游谈无根，陷于空衍义理的误区，此宋明理学所以空疏也。故愚以为，当代汉语训诂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宜突破门户的樊篱，将考释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专门之学与通人之学相贯通，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观照，还有就是本书所探讨的训诂学与诠释学相融会，不断注入时代的学理机制，才有望进入现代学术的新境界。

玉梅不是我的学生，但相识以来，一直视我如师，比起我所教过的一些学生，更其懂得尊师重学，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拜读她的大作，不禁想起自己当年身处闹市、如屏居山野一般的写作情境，亦更加感念先师陆先生的博大胸怀和提携之恩。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抚今追昔，推己及人，写了上面的话。是为序。

丙申年上元节

于北京寓所居易斋

序二 打开训诂学研究的广阔空间

汪启明

训诂学是小学一门，兴隆于汉。历代训诂学家或“注我”，或“我注”，或“破”或“不破”，都以经为主，兼及子史，以注或注上再注为宗。清代以前的漫长时间，没有训诂基础，难成学问大家。至清，举凡士子，不训诂，无以言。

清末民初，章太炎引领小学实现了语言文字学转向；中叶，一些学者把训诂学归入语文学而不是语言学，提出建立“新训诂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训诂学和其他涉古学问受到严峻挑战；新时期，有关训诂学的理论、主张、实践异彩纷呈，但无论是狭义的训诂学或广义的训诂学，理论的训诂学或实践的训诂学，新训诂学或传统训诂学，始终未能打破为中国传统文献服务的樊篱。因此，学界提出了改造训诂学，变训诂学为语言学一个部门的任务。但也有学者认为，改造训诂学，会消解训诂学；不改造，训诂学同样会式微。训诂学既要守正，又要创新，颇有戴着镣铐跳舞的意蕴，尤其在古籍数字化大潮到来之际，乃至有“颓势”“死刑”之说。虽然语言尖锐，但总的趋势，即训诂学学科本身的消解步伐并没有停止，这是事实。回顾近年的训诂学理论著述，或以为训诂学应转变为词汇语义学；或以为应以训诂学

为基础,建立注释学,甚至将训诂学更名为中国注释学;更有主张转型成文献词义考据学者。

至于训诂学未来走向,不少学者做过预测,悲观者多。近读张玉梅博士《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利用训诂学相关理论,全面、系统分析了清初来华传教士南怀仁的作品之一《教要序论》,令人眼睛一亮。前此学界以训诂学观照域外汉籍,多从训诂实践的角度切入。无论欧、美、日、韩、越、梵诸汉典,或介绍,或考释,或整理,全面性、系统性差强人意。这部书则让人觉得一个新的训诂学研究空间已被打开,但其意义似又不局限于训诂学本身,对中国训诂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及研究领域的拓展可能带来巨大的张力。

一、开拓比较训诂学的学术视野

世纪之交,尽管训诂学在新理论、新领域、新材料、新观点、新手段方面有所突破,如语源的探讨、典制的剖析、俗字的研究、语义的介入、文化的影响,但这些方法多在贾、马、服、郑时期就广泛使用。新学问缘于新材料,近年佛教语言研究和简帛文献研究成为显学,出土文献、敦煌文献等材料则让训诂学有了可资利用的重器,将其运用于文献语言考据的成果数量不小、质量精良,但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却是清人研究的延续,没有从总体上改变训诂学本身以中国传统文献为宗的发展格局。

比较训诂学的滥觞。张玉梅博士在她的书中,开宗明义,就从传统训诂学与西方诠释学的相同点切入。作者指出,二者的内涵相似,学科定位相似,发展阶段和内容相似。中国古代,以训诂学为核心的小学把经学典籍的解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在用传、笺、疏、集解、正义释读古代文献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章旨、义理、辞章、语法、逻辑、修辞现象。它往往根据文字的形体与声音,讨源溯流,以求文献的正确理解。为了诠释、考证以《圣经》为代表的古代文献,欧洲也同样早就出现了“诠释学”(又称“释义学”),其作用相当于中国的“训诂学”。研究《圣经》时,又被称为“释经学”,并一度成为诠释学的主流。西方中世纪出现教派冲突,对文本的真伪、教义的理解产生分歧;中国早在西汉也产生过今、古文之争,有石渠、白虎之辩。前人多认为,汉学重训诂,守汉唐旧注,所谓“疏不破注”,而宋学重义理,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朱熹等认为天地万物与我同体,要打通“外王”与“内圣”之门,主张“致知”在“格物”。当然,我们也应该知道,汉学不仅讲训诂,也重视义理;同理,宋学也不是完全不讲训诂,只讲义理,其中如朱熹的训诂学,成就还相当显著。最后,我们还要了解,无论训诂学还是释经学,他们的目的都不在古,其意在当下。

相似性是比较研究的前提。作者在第二章特别指出,从发展历史上看,诠释学与训诂学在 18 世纪前的发展道路有相似之处。西方的诠释学与中国的训诂学均以对经书的理解与解释为起点,之后又扩展到对一般文献的理解与解释,并形成与自己的语言理解与解释相适应的各种规则。西方的解释学自亚里士多德始就从大量的文字、声韵考订实践中提炼了许多语言学规则,甚至在文艺复兴时代,人们还使用这些规则并通过语言学家和注释家去理解古代文本。从定义看,无论是西方的解释学或是中国的训诂学都以解释文本意义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诠释学认为,文本解释是文义理解的桥梁,语言是人类存在的中介,人类世界全部经验具有语言性,语言是诠释学问题的起源与归宿。

中国的训诂学也是以文献语言为突破口来切入文献意义解释的,历来的训诂学都是以古文献的语言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从功能、释义模式上看,《教要序论》解说《圣经》的方式与我国训诂学解释古代文献很类似。而且,在当下国家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的时候,传统训诂学如何打开自己学术视野,把“张有之学”变成经世致用之学,这部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作者从语言入手,着眼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重在异质文化的入乡问俗。它从训诂学的角度,总结《教要序论》的释词、释句、训诂学方法,发凡起例,释难解惑。

术语体系的归纳。一个学科的成熟,总是以一套完整的学术话语体系和一批表达方式科学、表意明确的学术术语来构成的。作者在第五章特别总结了《教要序论》的训诂学术语运用,说明了当南怀仁用西方人的思想、文化影响康熙皇帝时,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训诂学,以及训诂学中承载的典籍文化、思想文化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南怀仁。

这样,阐释二者之同,分辨二者之异,从学理上探讨同、异的原因,又从历史的发展阶段上加以比较,“比较训诂学”这个词语几乎跃然而出。我们之所以用这个术语来定位《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这部书,正如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同理,比较训诂学也不是训诂学的比较,不仅仅是1+1的平行比较,也是影响比较,更是文化的比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称这部书是比较训诂学的开创性作品,不为过誉。

二、扩大了训诂学的研究领域

无论是汉之贾、马、服、郑,唐之陆、孔、啖、赵,宋代程、朱、

陆、王,清代戴、段、二王,还是近代的章、黄,他们训诂学的对象与范围都是用汉语汉文写成的中国古代经典。仅从对象看,即使是今天,我国大多学者的研究旨趣也还没有脱其窠臼。

域外汉籍研究近年已然有成为显学的兆头。有学者将其分三类,其中便包括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文献学、历史学、文学、哲学已先行一步,训诂学界亦应把眼光置于域外典籍在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来思考。张玉梅博士把西方人创作的《教要序论》纳入训诂学的研究领域,使得研究范围有所扩大。可见,训诂学虽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但其适用范围却不囿于传统的中国古典文献,若能将应用范围扩大到域外汉籍,对丰富我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内涵和语言学学科理论体系将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中国训诂学在历史上的研究边界是不断扩大的,它的最大特色是在内容、对象和方法方面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时间绵延的线条上,训诂学家从以经为主,到经史并重乃至对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和爬梳。由于时代和眼界的局限,我们没能看到历代的训诂学者把自己的目光投射到域外典籍的系统研究中。

新材料的发现和使用,势必引起学术观点的惊人变化和研究手段的重大改良,如果讲学术前沿,挖掘新材料历来就是。前人治学,讲求“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在纸本时代,这无疑是正确的。器物时代,“书”理应包括甲骨、金文、石刻、简帛、印泥、瓦当等各类形态。眼下训诂学又遇上了典籍电子化时代。应该说,传统训诂典籍与电子传播时代的文本异曲同工,在这个时代,训诂学应该有更大的用武之地。电子文本的一大特点是在同一个界面可以展开多个文本,每个文本又可以实现“超

文本链接”。1967年,法国克里斯蒂娃《封闭的文本》提出超文本是“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其他文本的表述”。训诂对古代文本进行注释、解说,体例有传、说、记、解、注、笺、章句、集解、义疏、正义等,在印刷格式上,多正文、注文混排,以词义、读音、说理、史实、山川、人物等入注,阐发经义。原文则不断被注文随意穿插、分割,形成孤立的片段,与注文纠集缠绕,从而丧失其作为连贯文本的线性特征。训诂学采取随文注释的体式,最大限度地突破了传统印刷书籍的空间结构对阅读和行文的限制,在二维平面上达到了三维空间的超文本效果。超文本文件还可以在线条式文本的任何一处,指向文本、图像、声音、动画等任何形式的文件。随着训诂学对象的扩大,古籍电子文本时代,训诂学将会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从传统的纸本到出土文献,再从出土文献到电子文献,文献形态不同,但训诂学家所做工作之目的和意义应该没有不同。网络文献语言需要训诂学家,在将来某一天必定成为现实。古代的训诂学不同于现代的训诂学,今后的训诂学较之现代的训诂学更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随着传播手段的演进,“文献”含义的变迁,训诂手段也要相应地发展,这没有疑问。因此,这部书在训诂学理论的建树上具备重要的创新意义。

三、探讨中国训诂学的学科归属

作者用西方诠释学 and 中国的训诂学进行比较,就不能不提到“语音中心主义”(又称语音中心论)。语音中心主义是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核心问题,基督教《圣经》中广为人知的“太初有言”(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就是其典型表现。“语